

从《高僧传》看汉僧之出家受具及其律制问题^{*}

屈大成

提要：有关中国古代僧人的研究，多着重他们在义理、宗教、社会、政治等方面的建树，而对一般僧众之出家、拜师、受具、住锡、游化、衣食、舍世等生活片段，文献记载零碎，也较少受学者注意。其实，出家等皆为僧众宗教生活的重要组成部份。本文以慧皎《高僧传》有关数百汉僧出家受戒的记载为研究对象，归纳他们的出家因由，及带出相关律制问题的讨论，期望能对古代僧人的生涯，以及印度律制于中土的施行有更多了解。

屈大成，哲学博士，现任职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。

主题词：高僧传 出家 具足戒 十诵律

有关中国古代僧人的生平及其活动，主要见载于《高僧传》、《续高僧传》、《宋高僧传》等类传式僧传，著名者记载较详，其余只知生平梗概。而且，僧传旨在树立理想僧人——“高僧”的典范，倾向隐恶扬善，择述僧众在不同范畴的贡献，以及能凸显高尚情操者，非有闻必录。如是，僧众之出家、受具、游化、衣食、离世等生活片段，语焉不详，其实这些皆为宗教生活的重要部分，值得探讨。本文以慧皎（497—554）《高僧传》所载汉僧为研究对象^①，探讨他们出家受戒及相关的戒律课题，期望能对汉僧的律制生活，以及印度律制于中土的施行有更多了解。

一、出家和受戒

出家，乃出离家庭生活，专心修行，始源于古印度吠陀时代，佛陀承袭传统，定立出家受具足戒、沙弥等律制。这些律制连同戒条，在佛陀入灭后结集成律藏，经派系分裂，各自传承，形成多部律典，于东晋末陆续传至中土。佛教律制，是佛陀就弟子的实际行事，因应社会环境、世俗的反应等，逐步制定，出家受戒也是这样。在佛教形成的初期，出家受戒没太多仪轨，佛陀叮嘱发心修道者说：“善来比丘受具足戒，于我善说法律能尽一切苦，净修梵行”^②，或者说三次：“我某甲归依佛、归依法、归依僧，今于如来所出家，如来至真等正觉是我所尊”^③，便已出家受戒。所以律典常把出家 and 受具连在一起

说，视两者为同一回事。受具的年纪，最初也没有限制；其后有少年受具足戒后，未能持戒，耐不住饥饿，遂有最低 20 岁的规定^④。又由于佛教徒日多，良莠不齐，佛陀再指令受具者须由十师作证，接受“十三难十遮”的资格审查，经白四羯磨，才可晋身为比丘，并成定制，沿用至今。

至于沙弥的出现，缘于佛陀在成道五年后回乡，俗家儿子罗睺罗年约 10 岁，欲出家学道，佛陀令舍利弗化度，罗睺罗承诺守十戒，成为沙弥^⑤。可见沙弥的设立，最初是为了照顾年少出家者。而众律典对于沙弥和受具的关系，意见不一：《五分律》记有比丘不先与他人受沙弥戒，便与受具，佛陀不表同意^⑥。《十诵律》的释论《萨婆多毘尼毘婆沙》指出，如直接受具，即能具足五、十、具三种戒，但这样做既不依次第，又破坏威仪；如次第受这三种戒，可调伏烦恼，增强善心，持戒才坚固，可见其以沙弥为受具前的预备阶段^⑦。《十诵律》和《摩诃僧祇律》不见这说法^⑧。《四分律》指可跳过沙弥戒，直接受具，虽然授予者得罪，但受者得戒^⑨。印顺因此评论道：“如年满二十出家的，虽没有受沙弥戒，就直接受比丘戒，也还是得戒的——这是吻合佛制本意的，不过从发展完成的僧制来说，似乎不太理想而已。”^⑩

二、《高僧传》所载汉僧出家 and 受戒的情况

《高僧传》所覆盖的时期，始自汉永平十年

(67), 终于梁天监十八年(519); 所记僧数, 正传 257 人, 附传 200 多人, 其中仅 65 人标明出家年岁; 有些虽没写明年岁, 但可知大约范围: 康僧会(?—208) 10 多岁父母过世, 服丧 3 年后出家, 僧柔(431—494) 9 岁随叔父游学后出家, 竺法乘 13 岁侍奉竺法护, 慧次 15 岁随师游化, 僧侯 18 岁蔬食礼忏, 道整于苻坚(357—385 在位) 死后出家, 而他生于 335—338 之间, 时约 50 岁。又僧传记智俨和僧瑜“弱冠出家”, 僧诜“弱冠方出家”。按古代男子 20 岁行冠礼, 象征成年, 但体还未壮, 所以称弱冠, 后冠年用来泛指 20 左右的年纪; 而“弱冠方出家”中“方”字, 显示出年纪偏大才出家的语气, 可见这三人都约 20 岁出家。另竺佛念和慧观(宋元嘉[424—453] 中卒) 均“弱年出家”, 道宝“弱年信悟……将就下发”, 弱年是弱冠之年的简称, 这三人在 20 岁或之前已出家。还有约百人, 《高僧传》描述为“少出家、少入道、少持戒行、少而蔬食苦行”等。综合而言, 汉僧出家最小者为 3 岁之法显(334—420), 最大为 50 岁之道坚, 20 岁以下出家者有 50 多人, 当中以 16 岁最多, 有 11 人; 18 岁次之, 有 9 人, 皆颇为年轻^⑩。

至于汉僧受具戒, 《高僧传》提到 17 次, 年岁仅一次标明: 慧基“年满二十, 度蔡州受戒。”其他只可作推测: 竺道生(?—434) “年至具戒”, 智秀和僧佑(445—518) “年满具戒”, “年至”和“年满”意为年纪已足受戒, 即 20 岁。宝亮“年十二出家……及具戒之后, 年二十一至……”, 他受戒在 21 岁前, 即 20 岁。道安(约 312—385) 在入邺都师事佛图澄(232—348) 前已受具戒, 即在 24 岁前。于法兰“十五出家, 迄在冠年, 风神秀逸”, 冠年即 20 岁, 或即受戒的年岁。至于法显, 《高僧传》只记“受大戒”, 《出三藏记集》则记“二十受大戒”^⑪, 慧皎或以受具即 20 岁, 不赘述。此外, 《高僧传》记 11 人年少出家, 之后受具, 虽没提及年岁, 但据文意看, 年纪当不会太大, 例如: 僧隐“年八岁出家……及受具戒”, 僧导(362—457) “十岁出家……迄受具戒”。

三、汉僧出家缘由

《高僧传》对汉僧出家的因由, 较清楚述及者不到 30 人, 其余语焉不详, 以下归纳成四项交代。

(一) 宿世因缘

《高僧传》常记汉僧天生异禀, 幼年已倾心佛法。例如: 竺法乘(幼有神悟)、于法兰(少有异操)、道宝(弱年信悟)、竺法义(幼而颖悟)等。较详细描述有三例: 玄高(402—444) 母亲寇氏本信外道, 头胎是女儿, 天生信佛, 祈愿母亲归信, 一天寇氏梦见梵僧在室内散满了花, 便怀孕生下玄高。昙谛(宋元嘉[424—453] 末卒) 的母亲黄氏午睡时梦见一僧人呼她为母亲, 又留下一柄尘尾和书镇二枚, 之后怀孕生了昙谛, 原来他是僧契(约 346—约 415) 老师弘觉的转生, 尘尾和书镇乃当年弘觉为后秦姚萔(384—394 在位) 讲《法华经》所得的赏赐。僧佑(455—518) 几岁大到建初寺礼佛, 不肯回家, 父母不得已容许他入道。

(二) 佛法启迪

不少汉僧教育背景良好。例如: 帛法祚(3 世纪末) 出家前曾被征为博士; 竺法义(307—380) 13 岁时已懂问竺道潜(286—374) 为何孔子罕谈仁和利; 慧观“十岁便以博见驰名, 弱年出家”。有些汉僧家世显赫, 多必受过充足教育。例如: 竺道潜是晋丞相王敦(266—324) 之弟; 道宝是晋丞相王导(276—339) 之弟; 僧契是晋河间郎中令傅遐的长子; 道敬(369—420) 本琅琊胄族, 晋右将军王羲之(303—361) 曾孙等。以下六例, 《高僧传》明言乃受高僧或佛法启迪而出家: 法遇(晋太元[376—396] 中卒) 专志研读古籍, 遇上道安, 信服出家。僧富尽览经史, 随名士习凿齿(?—384) 学习, 听道安讲《放光经》, “有心乐道”。昙戒(晋隆安[397—401] 中卒) 好读古书, 听于法道讲《放光般若经》, “废俗从道”。僧肇(384—414) 遍读经史书籍, 见到《维摩经》, “因此出家”。慧远(334—416) 博览六经, 精通老庄, 听道安讲《般若经》, “豁然而悟”。僧瑾(宋元徽[473—477] 中卒) 少时擅长老庄诗礼, 佩服昙因而出家。

(三) 亲属离世

有汉僧在父母离世后出家。例如: 康僧会“二亲并终, 至孝服毕出家”。僧彻(383—452) “少孤……年十六入庐山造远公”。僧镜(宋元徽中卒) “家贫母亡……服毕出家”。竺僧度年少丧父, 本与同郡女子苕华成亲, 怎料苕华父母突然死去, 竺僧度母亲亦逝世, “忽然感悟, 乃舍俗出家”。竺法旷(327—402) 和道恒在后母也离世后出家。有的虽得其他亲人抚养, 但最终都出家。例如: 于道邃“少而失荫, 叔亲养之……至年十六出家”, 法期“早丧二亲, 事兄如父, 十

四出家”等。另一例是法悟 50 岁时丧偶，他跟六名儿子“鬻然慕道，悉共出家”。

（四）战乱残杀

有的汉僧感怀战乱残杀而出家。例如：昙邕曾随苻坚参加淝水之战，回长安从道安出家。玄畅少时家族遭胡人剿灭，他幸免于难，往凉州出家。智称曾随军北伐猗狁，屡生恻隐心，后偶读到《瑞应经》，感悟出家。又三例跟打猎有关：令韶少好游猎，后发心出家。慧达年轻时喜欢打猎，31 岁突然昏死游地狱，看到各种苦报，苏醒后即出家。法宗和净度见负伤流产的母鹿，忍痛舐着小鹿，遂“摧弓折矢出家”。

还有些出家缘由个案较少。例如家世信佛：支遁（314—366）“家世事佛，早悟非常之理”，僧隐“家世正信……八岁出家”。或因看到异象：普悟少时，常在日光中见圣僧在空中说法，遂“苦求出家”。此外，法显父亲怕他夭折，让他出家，又是另一种因由，详见下节。

四、出家受具牵涉的律制问题

上述一些汉僧出家受具的情况，如跟律制的规定相比对，可见印度律制于中土施行时的调整和微妙考虑，下分八节讨论。

（一）孩童出家

出家年岁的规定，律典说法不一，《僧祇律》记比丘起初化度小孩出家，但他们不能照顾自己，惹来讥嫌。佛陀遂制定 7 岁或以下，不懂好恶者，不许出家，但已出家者，不应驱逐^⑬。《十诵律》所记的制律缘起有些出入：一居士带两童出家，啼哭闹事，引起僧尼行淫生子的流言，佛陀遂制定未满 15 岁者不得成为沙弥。后来阿难收养了两名小孩，因年岁未足，不能出家，佛陀修订能驱走僧众食物上鸟鸟者，可成为沙弥，但不能少于 7 岁^⑭。《四分律》记小孩能驱鸟、持戒、能一食者，听许出家，没提到 7 岁的下限^⑮。《五分律》记阿难收养的两小孩大者 8 岁、小者 7 岁，佛陀听许化度他们和能驱鸟鸟者，也没有设年岁下限^⑯。法显 3 岁出家，依《四分律》和《五分律》来看，并无问题。

（二）病者出家

法显三位兄长都夭折，其父怕法显有同样遭遇，因此 3 岁便让他做沙弥，但仍留在家，后得重病，其父送他回寺院，两三天就病好。律典对病患出家，限制颇多。《十诵律》等有这记载：耆婆药师只愿医治瓶沙王和佛比丘，有些居士欲治疗癰、痈疽、癰瘡等重病而出家，众比丘为照

顾他们，妨碍了修道。可是，病者痊愈，便舍戒回家。佛陀因而不准患恶重病者出家受戒^⑰。铜鍱部律论《善见律毘婆沙》指癰癰等如长在身体的隐蔽处，不再增大，或小时患生疣，不属瘤病，年纪大会脱落，皆可出家^⑱。由此可见，如病患不重，日后会痊愈，不碍修道，可以出家；借出家来治病，则违犯律制。检视法显的个案，其父怕他病死，欲到寺院医治，安排他出家，实不符律制精神。

（三）阉人出家

《高僧传》记有两阉人出家：道整没长胡须，家有妻妾，但无儿女，被称为“阉人”。定林上寺有沙弥圣进，本是“阉人”，信佛至笃，苦守戒律。阉人，佛典称“不能男”、“黄门”，即男根损坏者。律典对他们可否出家受戒，有详细论述：《十诵律》记跋难陀释子度不能男出家，这不能男竟抚摸出家和在家居，恶名流布。佛陀知悉，指不能男分“生（天生）、半月（性欲弱者）、妬（见他人行淫阳具才勃起者）、精（阳痿早泄者）、病（后天阳具脱落、朽烂或遭虫噉）”五种，都不应出家受戒；已出家受戒者，应被摈出，化度者犯突吉罗。如在出家受戒后才成为病不能男，不起淫念，可续留僧团；但他们舍戒后不可再出家。《僧祇律》分不能男为六种，生、捺破（从小被人捺破睾丸者）、割却（被王臣割去阳具者）三种如已出家者，应驱逐；妬、因他（需他人触摸阳具才勃起者）、病三种可留在僧团，但一旦生起淫念，也须驱逐^⑲。《四分律》又制定比丘如被盗贼、仇家、恶兽断截阳具及睾丸，或由于生病或意外，致阳具脱落，不应被摈出^⑳。《五分律》制定自行截除阳具前头或一半者，犯突吉罗；全部截除以至再去除一睾丸，偷罗遮；截除阳具和两睾丸者，摈出。如阳具和两睾丸为恶兽咬啮，或为仇家伤害，或因病自然烂坏，不能复原，皆应摈出^㉑。简言之，不能男未入道者不应出家受戒，已出家受戒者如不起淫念，部分仍可留在僧团，可见律制并非一概不接受不能男。如把出家和受戒分开来看，不能男不可受戒，是很明确的；如他们矢志不起淫念，可否通融出家呢？实堪斟酌。要注意的，是道整出家后遁迹商洛山，不知有否受戒；圣进仅为沙弥，二人或正因为阉人身份，不能正式成为比丘。

（四）奴仆出家

律典对奴仆出家，也有规定。《十诵律》记摩竭陀国瓶沙王准许国人出家学道，一奴仆响应

王命，离家修道，后为主人遇到，但碍于王令，无法捉回，迁怒佛教；佛陀遂制定如奴主不释放，奴仆不得出家，度者犯突吉罗^②。《僧祇律》有更仔细说明：白净王等释种鉴于奴仆出家，无人干活，佛陀因而制定如奴仆是家中婢妾生、买回来，或抄家没收回来者，奴主不允许，在本国和他国都不能受戒；如奴仆是别人施与，或自行投靠者，就算奴主不允许，在他国都可化度。如已出家者，不应驱逐^③。《四分律》和《五分律》皆说不得度奴仆，没提及奴主同意可以开许^④。据《高僧传》的记载，有3名汉僧原是奴仆：僧覆“少孤为下人所养，七岁出家”；慧安少时遭掳掠，沦落成荆州人的奴隶，得主人喜爱，“年十八听出家”。如是看，慧安属抄家没收这类奴仆，得主人允许出家，合乎《十诵律》和《僧祇律》的要求。僧覆是下人所养，身份相当于婢妾所生者，须主人允许，方可出家，但僧传没有这方面的信息。

另一个案是江陵长沙寺慧远，原是慧印的“苍头”（即奴仆），慧印让他出家。《四分律》规定僧人“不畜养奴婢”^⑤，但僧团则可以。据《僧祇律》，某僧不应接受他人施舍的奴婢，僧团全体则可接受，以协助处理杂务。由于他们令僧众免于犯过，即所谓“为僧作净”，故称“净人”，净人中专职守护寺院者，称“园民”^⑥。《十诵律》也记佛陀听许僧坊和寺院拥有“使人”^⑦。《目连问戒律中五百轻重事经》指如知来人是佛奴，未得其主人同意，比丘化度了他们；或先不知晓，后又不驱逐，皆犯重罪；这些奴仆也不是比丘^⑧。如是，慧远不是慧印的奴仆，而是属于寺院，他出家要得到全体僧众的首肯，并非慧印一人能决定；或因他为慧印所化度，故僧传记为慧印的奴仆。

（五）父母准许

出家受戒须得父母批准，《十诵律》记其缘起说：佛陀在迦毘罗婆城时，净饭王来访，表示佛陀、难陀、罗睺罗先后出家，内心愁忧，佛陀遂制定父母如不放行，不得给与出家^⑨。《僧祇律》对这规定有仔细分析：儿子分亲儿、养儿、自来儿三种。亲儿不论在本国或他国，父母也可不听准。养儿和自来儿如到了他国，不用问准养父母，也可受戒。如不依律制已出家者，不应撵出，负责授戒者则得越比尼罪^⑩。又《善见律毗婆沙》说如有人虽未得父母批准，但坚持要出家受戒，否则焚烧寺舍，可化度他们；如从他国来求化度者，也不须问准父母^⑪。后一说法跟《十

诵律》和《僧祇律》的相违背。

有些汉僧确须先说服父母才得出家：玄高年12入山欲出家，山僧以其父母未许，不予化度，玄高还家启求了二十日。僧远（414—484）年16想出家，父母不许，他遂长期蔬食忏悔，感动了父母。可是，有一例未得父母同意：智秀（梁天监[502—519]初卒）早有出家之心，但父母疼爱许，并秘密为他娶妻，智秀偷偷投身蒋山灵耀寺剃发。另一例情况有点复杂：僧佑从小喜好佛法，父母允许他出家，年14时，家人秘密为他娶妻，僧佑逃避到定林寺投靠法达，年满受戒。如是看，僧佑出家先得父母允许，后来家人不再同意，僧佑改投他师受戒。智秀和僧佑不得父母同意便受戒，按理不能通过“十三难十遮”的审查，有违律制。但据《僧祇律》，两人受戒了，就算不得父母批准，也可留在僧团，只是授者须受罚而已。

（六）朝廷公度

汉僧有五例出家须得朝廷准许：慧义（372—444）嘉许慧基（412—496）神采出众，启奏宋文帝（424—453在位），文帝见他应对允当，下旨设会剃度。道儒（410—490）年轻时羡慕出家，一直未能如愿，后得宋临川王义庆（403—444）为他“启度出家”。法愿（414—500）懂世间杂伎，进京见宋文帝，被派住后堂，主持阴阳秘术，多次“启求出家”。慧重（415—487）自行吃斋念佛，担任唱导，后为宋孝武帝（453—464在位）知悉，允许他到新安寺出家。法镜（437—500）年幼便想出家，一直未得批准；宋大明七年（463），慧益（？—463）烧身供养，向孝武帝请求“度二十人出家”，其一便是法镜。这种向朝廷申请，获批准才可出家的做法，称为“公度”，至迟于宋元嘉三年（426）已于南方实施。而从慧基须受皇帝查问，法愿多番请求，慧益烧身相求，配住寺院也由官府指定来看，公度的执行甚为严格^⑫。

（七）法物准备

昙称于晋末在彭城见一对老夫妇穷困潦倒，还俗伺候他们，两老去世后，昙称做工赚钱超度他们。丧事办完，昙称欲再次出家，但“法物置未备”，一度未能成事。《四分律》记无衣钵者无法入村乞食，故不得受戒。又有人临时借他人衣钵受戒，归还后没有衣服蔽体，佛陀再制定受戒者应乞求衣钵，如他人不肯施与，便买回来^⑬。《十诵律》记如沙弥剃度时没有袈裟，和尚应给与^⑭。《萨婆多毘尼毘婆沙》指出衣钵乃为了显

示威仪具足，令当前的人生起信敬心，但没有衣钵亦可得戒^⑤。如是，昙称未有法物，也可出家。

（八）得戒疑惑

智俨在家时曾违犯五戒，因此在受具后，时常怀疑未得戒，禅观多年，仍不能释疑，遂往天竺寻找答案。天竺僧入定，见弥勒确认智俨得戒。从律制角度看，智俨是否得戒，值得探究。对受五戒跟具戒之间的关系，《萨婆多毘尼毘婆沙》指出，杀、盗、淫、妄、酒五戒虽然是在家人遵守，但前四戒其实相当于比丘戒中的四重禁，即“五戒中重戒”。按犯四重禁者，会被逐出僧团，今生不能再出家；受具时也会审查有否违犯这四戒，曾犯者不能受戒。因此，如犯“五戒中重戒”者，不可得受八戒、十戒、具足戒、禅戒、无漏戒；就算舍弃了五戒，也不可再受这六种戒^⑥。又《五百轻重事》指出，犯五戒而没有忏悔者，不得受十戒；如先不知忏悔，知道后仍不忏悔，也不得戒^⑦。按此推论，犯五戒而没有忏悔，十戒都不能得，何况是具戒。如智俨出家前只犯了轻戒（如误取别人物品、两舌），忏悔便没事，以至受具后才忏悔，也算得戒；事实上，犯轻戒常有发生，智俨想必亦勤于忏悔，如由此怀疑不得戒，便没完没了。因此，智俨当犯了五戒中的重戒，按律制不能受具戒，所以他一直耿耿于怀，试图用禅观，超越世俗的层面，加以解决，而最终也靠弥勒确认。

五、总 结

从本文的论述，可得出以下《高僧传》所记有关出家受戒，以及是时律制的实践的一些观察：

一、观《高僧传》的记载，汉僧出家偏向年轻，或正因为这样，他们一到 20 岁最低年龄规定即受具，亦未见违犯这限制的例子。要注意的，是《高僧传》的目录标题一律作“某某寺（地）释某某”，唯一例外是“枳园寺沙弥释法匱”，特意标出“沙弥”一词；又“释法通传”附及的圣进，慧皎指明他是沙弥，可见慧皎对沙弥和比丘之别，颇为在意。如是，虽然《高僧传》就大部分汉僧无受具记录，但也无标示为沙弥，他们相信都已受具成为比丘。

二、《高僧传》所载汉僧出家，多由于宿世因缘。按业报轮回的教义，今生得以出家，是累世修道的结果。年少出家，可引证因果报应之说。其次，汉僧不少本为读书人，受佛法启迪出

家。如众周知，佛法充满人生哲理和形上玄谈，跟中国的老庄思想，十分投契，加上魏晋南北朝时，社会动荡，佛法的宗教情怀，更易为人受落。此外，出家者不少都是孤儿，他们出家，或有生活照顾的考虑。又中国人重家庭关系，至亲离世，几为人生最大打击，由是出家，可以理解。凡此显示对某些人而言，佛法较中国传统思想更能解决人生问题。如是看，《高僧传》记出家之事，实隐含宣扬佛法之殊胜，跟僧传编纂的意旨相一致。

三、汤用彤曾评论道：“南方在宋代除《十诵》以外，已几无律学，齐梁更然。”^⑧从《高僧传》所记的律师来看，《十诵律》确最受传诵。可是，上文谈及法显 3 岁出家，不合《十诵律》的规定，反观《四分律》和《五分律》则无这限制。又智秀和僧佑不得父母同意便受戒，按《十诵律》不能容许，《僧祇律》则予通融。由此可见，在律制实践方面，汉僧非全依《十诵律》行事，其它律典也有影响力。

四、阇人按律制不应出家受戒，《高僧传》却有道整和圣进两例，前者或无受具戒，后者仅是沙弥，二人未完全犯规。又《高僧传》记智秀和僧佑不得父母批准而出家受戒，明显违反律制，僧传没为他们作辩解。更值得注意的，是智俨或犯了重罪，仍被确认得具戒。这些违律的案例，很可能是中国佛教界平衡实际情况和律制要求，而作出的通融处理。

五、上文提及康僧会、僧彻等在父母死后，守丧三年才出家。中国自古规定，凡子女为父母守丧，住在墓旁草屋，不饮酒吃肉，不寻欢作乐，不娶妻纳妾，不能求仕和访友等，以示哀思，出家修道按理也应避免。戒律本身并无谈到守丧者期间可否出家，可见中土僧人尊重传统礼教行事。

六、后赵王度向石虎（295—349）上奏，说汉代只准西域人建寺侍奉，汉人不得出家，魏亦承袭汉制^⑨。桓玄（369—404）说“晋人略无奉佛，沙门徒众皆是诸胡”^⑩。可见自西汉末佛教传入，直至西晋，汉人无出家自由。但是，随着信奉者日多，汉人出家，禁无可禁，朝廷为便管理，遂掌控出家的批核权，不准私度。按出家受戒，本是个人修为和僧团内部之事。义净（635—713）记在印度，“众僧名字不贯王籍”，“如来出家和僧剃发，名字不干王籍，众僧自有部书”^⑪。因此，汉人出家要受朝廷审批，违背佛教须跟官府保持距离的精神。约成书于五世纪中

后期的疑伪经《仁王般若经》也指出，僧尼编入僧籍，为官府控制，仿如“兵奴法”，不再是佛弟子；再如设立僧官，统领僧众，互相牵制，有如“狱囚法”，佛法因此很快衰亡，这明显是对公度施行不满的回应^⑫。反观《高僧传》所记的五个公度个案，不见有抗拒，慧皎也没下评论，似乎接受了这安排。又公度于宋元嘉年间已实施；可是，《高僧传》在此之后所记的出家者逾百人，不见启求公度，或是这做法已十分普遍，亦无人反对，除非缘由特殊（例如烧身），否则无必要记下。

最后要一提的，是汉晋南北朝时期的僧数以十万计，但《高僧传》只载及 400 多人，并以“高僧”为收录标准。因此本文所能探讨的，十分局限，当时律制施行的实际情况，当远比以上讨论的为复杂。

（责任编辑：又小易）

* 本论文写作得香港研究资助局的资助（项目编号：CityU 151007），谨此致谢。

- ① 本文所谓的汉僧，还包括于先祖时已移居汉地的西域人，如康僧会、竺法护等。
- ② 高楠顺次郎、渡边海旭编：《五分律》卷 15，《大正新修大藏经》（下简称《大正藏》）第 22 卷，台北：新文丰出版社，1983 年翻印本，第 105 页上。
- ③ 《四分律》卷 32，《大正藏》第 22 卷，第 793 页上。
- ④ 《十诵律》卷 21，《大正藏》第 23 卷，第 150 页中。
- ⑤ 《四分律》卷 34、《五分律》卷 17、《僧祇律》卷 29，《大正藏》第 22 卷，第 809 页下、第 116 页下、第 460 页中；《十诵律》卷 21，《大正藏》第 23 卷，第 149 页下。
- ⑥ 《五分律》卷 17，《大正藏》第 22 卷，第 119 页中。
- ⑦ 《萨婆多毘尼毘婆沙》卷 1，《大正藏》第 23 卷，第 508 页上。
- ⑧ 道宣（596—667）《四分律行事钞》卷下说：“《五分》《十诵》，先与五戒，后受十戒。”（《大正藏》第 40 卷，第 150 页中）笔者检索这两律典，都没有相类似的引文。
- ⑨ 《四分律》卷 35，《大正藏》第 22 卷，第 814 页下。
- ⑩ 印顺：《成佛之道》，台北：正闻出版社，1995 年版，第 184 页。
- ⑪ 本文采用汤用彤校注本《高僧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2 年版，为免繁琐，不一一注明页数。读者可于此书之目录或索引据僧名翻查到僧传原文。
- ⑫ 苏晋仁、萧链子点校：《出三藏记集》第 15 卷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5 年版，第 573 页。
- ⑬ 《僧祇律》卷 23、29，《大正藏》第 22 卷，第 418 页上、第 461 页中。
- ⑭ 《十诵律》卷 21，《大正藏》第 23 卷，第 151 页中一下。
- ⑮ 《四分律》卷 34，《大正藏》第 22 卷，第 810 页下。
- ⑯ 《五分律》卷 17，《大正藏》第 22 卷，第 115 页下、第 117 页上。
- ⑰ 《十诵律》卷 21，《大正藏》第 23 卷，第 152 页中；《四分律》卷 35、《五分律》卷 17、《僧祇律》卷 24，《大正藏》第 22 卷，第 814 页中、第 116 页上、第 420 页下。
- ⑱ 《善见律毘婆沙》卷 16，《大正藏》第 24 卷，第 789 页下。
- ⑲ 《僧祇律》卷 23，《大正藏》第 22 卷，第 417 页下—418 页上。
- ⑳ 《四分律》卷 35，《大正藏》第 22 卷，第 813 页中一下。
- ㉑ 《五分律》卷 17，《大正藏》第 22 卷，第 119 页上。
- ㉒ 《十诵律》卷 21，《大正藏》第 23 卷，第 151 页下。
- ㉓ 《僧祇律》卷 22，《大正藏》第 22 卷，第 421 页下。
- ㉔ 《四分律》卷 34、《五分律》卷 17，《大正藏》第 22 卷，第 807 页中一下、第 115 页中。
- ㉕ 《四分律》卷 53，《大正藏》第 22 卷，第 962 页下。
- ㉖ 《僧祇律》卷 33，《大正藏》第 22 卷，第 495 页中。
- ㉗ 《十诵律》卷 56，《大正藏》第 23 卷，第 413 页下。使人，意为受驱使之入，即奴仆。
- ㉘ 《五百轻重事》，《大正藏》第 24 卷，第 973 页中。
- ㉙ 《十诵律》卷 21，《大正藏》第 23 卷，第 152 页下。
- ㉚ 《僧祇律》卷 24，《大正藏》第 22 卷，第 421 页中。
- ㉛ 《善见律毗婆沙》卷 17，《大正藏》第 24 卷，第 792 页上。
- ㉜ 白文固、赵春娥：《中国古代僧尼名籍制度》，西宁：青海人民出版社，2002 年版，第 16—17 页。此书漏载慧基个案。
- ㉝ 《四分律》卷 34，《大正藏》第 22 卷，第 811 页下。
- ㉞ 《十诵律》卷 21，《大正藏》第 23 卷，第 149 页下。
- ㉟ 《萨婆多毘尼毘婆沙》卷 2，《大正藏》第 23 卷，第 512 页下。
- ㊱ 《萨婆多毘尼毘婆沙》卷 1，《大正藏》第 23 卷，第 507 页下。
- ㊲ 《五百轻重事》，《大正藏》第 24 卷，第 982 页中。
- ㊳ 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7 年版，第 593 页。
- ㊴ 《高僧传》卷 9《佛图澄传》。
- ㊵ 《弘明集》卷 12，《大正藏》第 52 卷，第 81 页中。
- ㊶ 王邦维：《大唐西域求法传高僧传校注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8 年版，第 114 页；《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5 年版，第 87 页。
- ㊷ 《仁王般若经》卷下，《大正藏》第 8 卷，第 833 页下。